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

罗 鹭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宗唐,直到万历年间公安派提倡宋、元诗,才突破前人的藩篱。但公安派只是首开风气,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与之相反,以谢肇淛、徐燊、曹学佺为核心的晋安诗派,虽然在理论上坚守了宗唐的诗学传统,但在具体的诗学活动中则非常关注元诗。徐燊红雨楼收藏有元人别集68种,在藏书史上留有佳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对元诗的批评,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曹学佺《石仓元诗选》选诗4224首,是元、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元诗总集。他们不仅在本地营造了阅读、批评、传播元诗的氛围,而且积极与主流诗坛进行交流和对话,共同影响了明末清初的诗学走向。

关键词: 晋安诗派; 谢肇淛; 徐燊; 曹学佺; 元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4)04-0131-09

中国诗歌史上的闽派,以明初闽中诗派、晚明晋安诗派^①、晚清“同光体”闽派影响最大。考察闽派诗人的诗学宗尚,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初闽中诗派宗唐,但仍然不脱元诗习气;晚清“同光体”闽派宗宋,但其代表人物陈衍编纂了《元诗纪事》;而晚明晋安诗派在坚守宗唐诗学传统的同时,受到公安派、虞山派等其他地域诗学宋、元风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宋、元诗的关注,从而开展与主流诗坛的对话。由此可见,不管是宗唐还是宗宋,明清时期闽派的诗学传统中始终有“元诗”这一小传统的存在。尤其是晋安诗派的核心人物谢肇淛(1567—1624)、徐燊(1570—1642)、曹学佺(1575—1646)等,对元诗的搜集、阅读、编选、批评与接受,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即以上述三人为中心,探讨晋安诗派元诗接受的特色及其对明末清初诗学的影响。

一、明末元诗接受的诗学背景

从元代到明代,诗学风尚的主流是宗唐,但成化以前的诗人、学者,对宋、元诗尚能持包容的态度。弘治以后,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在理论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更是极力倡导不读唐以后书,因此,宋、元诗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宋、元诗予以激烈的批评。如胡缵宗说“汉、魏有诗,梁、陈、隋无诗;唐有诗,宋、元无诗。”

收稿日期: 2014-04-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元诗接受史”(09YJC751065)

作者简介: 罗鹭,男,湖南新化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讲师。

① 晋安诗派是以“晋安”命名的地域诗派,晋安即今福建省福州地区。晋武帝太康三年(282)设晋安郡,治所在侯官县(今福州鼓楼区),隋朝废。

梁、陈、隋非无诗,有诗不及汉、魏耳;宋、元非无诗,有诗不及唐耳。”^[1]这就彻底否定了宋、元诗的成就,阻隔了宋、元诗在明代中叶的传播与接受。然而,高呼口号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却很困难。人人都知道盛唐诗是典范,但学起来并不容易,后世有几人能真正达到盛唐诗的境界呢?时间一久,人心自然离散,或者师法晚唐,或者师法宋诗,甚至元诗。隆庆四年(1570),随着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去世,王世贞开始独主文坛二十年。他晚年的创作与批评,已经显示出这种改变的迹象^①。他最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艺苑卮言》公开谈论宋、元诗,《读书后》卷四有《书(赵松雪集)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二有《赵松雪手书十五诗后》,对赵孟頫诗句进行摘评,虽然都是以批评为主,但与复古派不读宋、元诗的主张背道而驰。他所推奖的“末五子”之一胡应麟,更是在《诗藪》中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专门论述元诗,并给予了较多肯定的评价。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复古派诗学内部的分化与变革。

万历后期,公安派崛起于诗坛,开始对复古派的诗学理论进行彻底批判。其中以袁宏道(1568—1610)的批评最为偏激,凡是复古派的主张,他都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2]这当然有些矫枉过正,估计他本人也不相信“唐无诗”的说法,但为了纠正七子派的弊端,只能以这样的声势去扫荡一切。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虽然在理论上提倡宋、元诗,但相比于元诗,袁宏道关注较多的还是宋诗。如《答陶石簠》:“弟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4]又说“放翁诗,弟所甚爱,但阔大处不如欧、苏耳。近读陈同甫集,气魄豪荡,明允之亚。周美成诗文亦可人。”^[5]《与李龙湖》:“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6]从这些尺牍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宋名家诗集有广泛的涉猎,但现存资料尚未发现他阅读元人诗集的记载。

袁宏道的同年好友毕自严(1569—1638)也是其同道,毕氏在给《类选四时绝句》作序时说“顾今世论诗者,多尊盛唐而卑中、晚,况宋、元乎?是选兼取宋、元者何?夫宋、元醞藉声响,间或不无少逊李唐,至匠心变幻,则愈出愈奇矣。昔人谓唐人绝句至中、晚始盛,余亦妄谓中、晚绝句至宋、元尤盛。”^[7]毕自严极力为中、晚唐、宋、元绝句鼓吹,正是出于对独尊盛唐的反拨。

相比于袁宏道的偏激,他的弟弟袁中道则持论平正通达。他在《宋元诗序》中承认宋、元诗不如唐诗,但也反对世人妄言宋、元无诗,因为这是气运所限,非人力可为,假使让唐人作词为曲,也未必能超过宋、元。而且,“宋、元承三唐之后,殫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即不得与唐争盛,而其精采不可磨灭之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此宋、元诗所以刻也。”^[8]这是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充分肯定宋、元诗的存在价值。这篇序是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新安潘是仁所刻《宋元名家诗集》而作,袁中道有感于明末宋、元诗集之罕见,认为是前、后七子“不必读、不必存”的谬论导致了宋、元诗集的沦亡,因此,他充分肯定潘是仁的贡献:“新安潘氏苦心购求宋、元诸集梓之,欲使两朝文字与三唐并垂不朽,是数百年来一大快事也!于余心极有合焉,故不辞而僭为之引。”^[9]潘是仁对宋、元诗的选刻,是非常成功的商业出版,尽管该书编纂很不严谨,存在严重的文

^① 孙矿《与余君房论诗文书》:“近十余年以来,遂开乱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长吉、玉川,一子瞻、鲁直……然弇州晚年诸作,实已透漏乱道端倪,盖气数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过也。”(孙矿《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清嘉庆静远轩刊本)李维桢《宋元诗集序》:“顷日二三大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诸君,以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何可废也?稍为摘取评目。”(潘是仁辑《宋元名家诗集》卷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新安潘氏刻本)可见在明人眼中,王世贞从复古派内部率先突破宗唐界限。

献问题,^[10]但他即时捕捉诗学潮流变化的敏锐性,仍然值得赞赏。

从明末清初诗学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公安派以宋、元诗破除前、后七子对唐诗的“执着”,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研究和学习宋、元诗,只是用一面旗帜替换另一面旗帜。因此,在公安派之后,诗坛呈现众声喧哗的格局:以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竟陵派,虽然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但走向了幽深孤峭的狭窄之路;以钱谦益(1582—1664)为代表的虞山派,受公安派和程嘉燧(1565—1643)的影响,继续鼓吹宋诗;以陈子龙(1608—1647)为代表的云间派,仍然坚持复古诗学的传统,不改宗唐风尚。那么,晋安诗派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诗学道路呢?

有学者指出,晋安诗派在逐渐摆脱后七子影响的同时,以闽派一贯的地域文学传统抵消公安派、竟陵派的冲击,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诗派。^[11]值得注意的是,闽派的诗歌创作虽以唐为宗,但其后期主要成员并不完全排斥宋诗、元诗,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万历以后诗坛主潮的影响。事实上,晋安诗派的核心成员谢肇淛和曹学佺等,与公安派、竟陵派都有一定交往。谢肇淛为袁宏道、江盈科(1553—1605)同年进士,与公安派关系极深,曾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参加该派中坚组织的葡萄社活动,又与竟陵派钟惺交好;曹学佺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来,即与钟惺建立起某种联系,又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访袁宏道于公安,虽不遇,却与袁中道建立交谊并同集赋诗。^[12]除了公安派,他们与虞山派也有直接或间接交往。曹学佺和钱谦益虽然终生没有见过面,但有深厚的文字之交。钱谦益《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说“余与能始宦途不相值,晚年邮筒促数,相与托末契焉。然予竟未识能始为何如人也。”^[13]崇祯十七年(1644),曹学佺应钱谦益之请,为其《初学集》作序。^[14]徐燏于崇祯十一年(1638)客游苏州,次年携子徐延寿到常熟拜访钱谦益。^①此外,徐燏还应钱谦益弟子、汲古阁主人毛晋之请,为其新刻《元人十种诗》作序。徐燏对元诗的批评也随着《元人十种诗》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由此可见,晋安诗人在明末与虞山派声气相通,深入开展诗学交流与对话。他们自觉突破地域文学传统的限制,在多元诗学格局中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着明末清初的诗学走向。

二、晋安诗派核心成员的元诗接受

晚明晋安诗派的核心成员有五人,即邓原岳(1555—1604)、徐燏(1561—1599)、谢肇淛、徐燏和曹学佺。由于邓原岳与徐燏去世较早,我们重点考察谢肇淛、徐燏和曹学佺三人对元诗接受。

(一) 谢肇淛的元诗批评

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3)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谢肇淛既是诗人,有《小草斋集》传世;也是藏书家,其小草斋以抄本著称于世,今海内外各大图书馆还有零星收藏;还是著名的诗学批评家,其《小草斋诗话》是一部有鲜明特色和理论主张的诗话,天启四年(1624)马欵称赞该书“皆独抒心得,发所未发,而归宗于盛唐,以扶翼正始之音,又摭摭宋、元以来近人佳句遗事,皆海内所未闻见者”,认为可与徐祯卿、王世贞、胡应麟三家诗话并列。^[15]

谢肇淛论诗虽以盛唐、汉魏为宗,但反对前、后七子的模拟剽窃之风。同时,在广泛阅读宋、元人诗集的基础上,他对宋、元诗也有不少真知灼见。谢肇淛反对宋人以理学、道学为诗,认为宋诗既不如唐诗,也比不上明诗,但对宋代大家的创作成就却予以充分肯定。关于元诗的整体评价,谢肇淛曾以之与晚唐诗作比较“初、盛、中、晚之后,几四百年无诗,至元而后有作,其调殊矣……与其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崇祯己卯,偕其子访余山中,约以暇日互搜所藏书,讨求放失,复尤遂初、叶与中两家书目之旧。能始闻之,欣然愿与同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34页。

为晚唐之巧而伤,宁为元之浅而婉。”^[16]他又将元诗与宋诗比较“自元而后,道学之语革矣。元人之才情音调自过宋人,而浓郁丰厚终觉未逮。虞、杨、范、揭、赵、萨诸公,自成一言可矣,欲其淹贯百代,包涵万里,未能比肩临川,而况庐陵、眉山乎!”^[17]这些都是符合晚唐、宋诗、元诗历史地位的中肯之论。

从《小草斋诗话》可以看出,谢肇淛对元诗的涉猎颇为广泛。他评价胡应麟《诗薮》所选南宋及元绝句“初读之似亦可喜,细玩俱不甚佳。”因而摘录更佳者,如赵孟頫《绝句》(春寒恻恻掩重门)、余阙《潇湘夜雨》、甘立《吴王图》、李孝光《寄人》、周驰《怀郭安道》、黄清老《登福山》、陈益稷《巴陵》等,认为这些诗“虽格不甚驯,而有言外之致”。^[18]他对贡师泰《玩斋集》更是作过深入阅读,称赞其歌行俊爽可喜,如《赋得姑苏台送吴元振江浙左丞》《挽陈尧夫妇》等,而律诗中的佳句如“长风断疏雨,缺月挂明河”“梨花春巷冷,榆叶夜窗虚”“雨隐巡盐鼓,风腥挂网舟”“客路频看月,征帆尚带霜”“满溪蓝水鱼初上,绕县青山莺乱啼”“荻笋洲青鸥鸟阵,杨花浪白鲚鱼群”“丹凤衔书辞北阙,白鱼供酒过淮河”“炼药房中猿候火,散花坛上鹤随班”“千门烟冷分榆火,二月春寒见杏花”“骤雨挟云行断岸,乱山涌浪入孤城”“海风船候槟榔信,溪雨茶煎橄榄香”等,“皆清婉有致,选者多未之及”。^[19]这些都是谢肇淛阅读元诗的独到之见,诚能发前人所未发。《小草斋诗话》还记载有关元诗的传闻和故事二十余则,反映了谢肇淛的诗学趣味。

(二) 徐燊对元诗的收藏、阅读与批评

徐燊,字惟起,后字兴公,福建闽县人。他与谢肇淛有姻亲关系,经常交流藏书心得,进行诗歌唱和。徐燊终生布衣,然嗜书如命,于书无所不读,其《徐氏家藏书目》著录元人别集68种、元诗总集6种,可见其收藏和阅读元人诗的兴趣很广。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燊偶得寒疾,卧病起床,身体仍觉委顿,忽有书商持元人《丁鹤年诗集》来售,徐燊将原本用于买药的钱购下了这本诗集,在床上吟诵一遍,病就好了(徐燊《丁鹤年诗》跋)。^[20]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书林佳话,可见徐燊对元诗和书籍的爱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徐燊对元诗的具体评论散见于《笔精》和《红雨楼题跋》。他对元诗的整体评价比谢肇淛要高,认为元代“人才之盛,超宋接唐。当时善鸣者凡数百家,皆流丽逸宕,以情采风致胜”(徐燊《张思廉玉笥集》跋)。^[21]在其他文字中也充分肯定元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除元诗大家外,他对傅若金、丁鹤年、陈樵、吴澄、何中、岑安卿、金涓、黄镇成等人的诗都颇为赞赏,如评陈樵、吴澄诗有巧思,评卢琦诗有唐调,评岑安卿诗清新有味,评黄镇成诗多奇警,等等。而他最喜爱的当数张宪,在题跋中称赞他的“古体炼句炼字,出入温、李;近体有法有度,比肩刘、许。读之惟恐易尽”(徐燊《张思廉玉笥集》跋)。^[22]又在笔记中评价其“诗多富赡,盖熟于史学者。以方驾铁崖,未知鹿死谁手”。^[23]这些评价,都是在阅读家藏元人诗集基础上的心得体会,非道听途说者可比。

值得说明的是,徐燊对元诗的具体批评,常以胡应麟《诗薮》为参照,如《傅汝砺诗集》跋“傅若金诗,在胜国卓然杰出者。胡元瑞持论甚正,《诗薮》多引傅句。”^[24]又如,徐燊家藏何中《知非集》六卷,其中佳句叠见,因而感慨“胡元瑞《诗薮》拈拔元人佳句无遗,亦不及太虚,真有幸有不幸也!”^[25]由此可见,徐燊对元诗的批评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胡应麟《诗薮》的影响。

徐燊对元诗的评论,最重要的是他为毛晋刻《元人十种诗》所作序。序文开篇提出“夫诗以唐为宗”的主张,显示了闽派诗人在公共话语中敢于坚守自己的诗学传统。随后对宋诗提出了批评:“自宋苏、黄诸公一变唐调,别出格律,南辕以后,竟趋道学,恒以义理入四声,去风人之旨远矣。”^[26]徐燊反对宋诗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宋诗改变了唐诗的声调、格律,二是道学一派以义理入诗,违背风雅传统。但元诗没有宋诗的这些毛病,因此,徐燊予以充分的肯定“迨夫胜国之世,虽以腥羶而主中华,其间修词之士蜂起,尽洗陈腐习气。冲恬者师右丞、襄阳,浓丽者媿义山、用晦,奇峭者迈长

吉、飞卿,人操寸管,各成一家,不失唐人矩矱。后之评者谓元诗直接唐响,真千古不易之论也。”^[27]晋安诗人主张宗唐,但并不否定元诗,在此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作为藏书家、刻书家的毛晋,其汲古阁在明末清初影响巨大,徐焞在与毛晋的交流中受到激励,也想把自己珍藏的元人诗集公之于众:“予性癖耽书,亦喜蒐先代遗稿,尚有元集五十余家,不敢自秘帐中,期与子晋公之同好,是则予之志也。”^[28]虽然后来没有机会与毛晋合作,但徐焞为曹学佺编选《石仓元诗选》贡献了自己的大部分藏书,也算是实现了他有志于传播元诗的抱负。

(三) 曹学佺与《石仓元诗选》

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居士,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四川按察使、广西右参议等。南明唐王称帝时官礼部尚书,清兵入闽,自缢殉节。其才学、官声、气节皆为后人所称道。曹学佺与徐焞、谢肇淛一样,也喜藏书,徐焞曾评价说:“予友邓参知原若、谢方伯肇淛、曹观察学佺,皆有书嗜。邓则装潢齐整,触手如新;谢则锐意搜罗,不施批点;曹则丹铅满卷,枕籍沉酣。”^[29]可见曹学佺不仅喜藏,而且善读,故著述宏富。曹学佺是明末福建诗坛的领袖人物,著有《石仓诗文集》一百卷,同时网罗历代诗歌文献,汇编为《石仓十二代诗选》,其中有《元诗选》五十卷。根据曹学佺自序和《西湖竹枝词》跋,可知《石仓元诗选》大约成书并刊刻于崇祯三年(1630)前后。

《石仓元诗选》五十卷,前四十八卷基本上是从作家专集选录,共74家,3796首,并在杨维桢后附徐焞所选《西湖竹枝词》22人、29首;卷四十九至五十主要从选本中辑录,共193人、399首。杨镰认为,《石仓元诗选》是缺乏文献积累而抄撮选本成书,除名家别集外,主要利用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和《元诗体要》,而前者是伪书,这种主要凭一两部总集选一朝之诗的做法,反映了晚明人的浮躁之风。^[30]从文献的严谨来看,晚明的元诗选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后人去清理其讹误。但如果着眼于整个诗歌接受史,元诗在接受经历了明代中叶的低谷后,从晚明开始逐渐恢复,到清代康熙年间达到高潮,那么,潘是仁、曹学佺等编选和刊刻元诗之举,正反映了当时诗学风气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明末编纂的元诗总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三家,除曹学佺外,就是新安潘是仁和常熟毛晋。潘是仁于万历四十三年辑《宋元名家诗集》,其中收元人诗集35家;毛晋于崇祯十一年(1638)左右刻《元人十种诗》,于崇祯十四年(1641)刻《元四大家诗集》,合计14家。相比之下,《石仓元诗选》收录近三百家,选诗4224首,是清代顾嗣立《元诗选》问世之前辑录元诗数量最多的总集。尤其是前四十八卷所选74家,尽管由于文献不足,存在不少阙误,但在晚明时期的福建,能够搜集到如此众多的元人诗集,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据《石仓宋诗选》自序,其宋、元诗选主要是合徐焞、谢肇淛、林懋礼三家所藏之书选编而成,这在书中可以找到内证,如成廷珪诗跋:“右《成原常集》,借自徐兴公家藏古本。顷坊刻有《成礼执》一册,岂廷珪别字耶?因选附之。”^[31]徐焞藏有“成原常《居竹轩集》四卷”,^[32]曹学佺所借应当就是该本。徐焞藏本虽已亡佚,但《石仓元诗选》据以选录130首,无疑具有较大文献价值。此外,《石仓元诗选》中较为珍稀的元诗文献还有黄清老诗34首、刘跃诗27首、严士贞诗62首等,应当也是从徐焞藏书借阅,因为徐焞藏有黄清老《樵水集》一卷、刘跃《渊泉集》三卷、严士贞《桃溪百咏》一卷。^[33]这些罕见的元人诗集,今已散佚,幸赖《石仓元诗选》部分保存了其面貌,可谓弥足珍贵。

曹学佺对元诗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石仓元诗选》自序:“予观夫鲜于、袁、赵、虞、杨、范、揭诸名家,可谓盛矣;而萨都刺、雅正卿之出自雁门、可都,又皆元上都地也,即若北朝之温子昇、庾子山,何多让焉?然人病其纤丽,以多咏物诗,如《鹤骨笛》《走马灯》《芦花被》之类,极其工巧,以求速肖,而风人比兴之义鲜矣。”^[34]全书选萨都刺诗176首,是选诗数量最多的一位诗人,超过虞集(108首)、赵孟頫(85首)、杨维桢(83首)等传统公认的元诗大家,说明曹学佺对元诗的兴趣所在。自序

虽然批评元诗纤丽、工巧,但有意思的是,在选录贯云石名作《芦花被》时,曹学佺本人也忍不住诗兴大发,唱和一首附录于后:“轻如阿縠软于绵,送上匡床野性便。一幅潇湘全胜画,五更风雨不成眠。回文岂藉秦娘锦,席地将全子敬毡。白露蒹葭堪作伴,伊人犹在梦江天。”^[35]由此可见,虽然元诗的纤丽、工巧等特色常为人所诟病,但理论和批评是一回事,创作又是另一回事,在厌倦了唐、宋诗之后,元诗的这种特色,不也能令人耳目一新吗?

综上所述,晚明晋安诗派的核心成员谢肇淛、徐燊和曹学佺等,他们既是藏书家,也是诗人和批评家。在藏书活动中,他们努力搜集元人别集旧本,通过编纂总集等方式保存和流通元诗文献;在诗学活动中,他们虽然坚持宗唐的地域诗学传统,但绝不保守,而是以开放的胸怀阅读、批评和接受元诗,并积极参与本地之外的诗学交流与对话,与公安派、虞山派一起,共同决定了明末清初以后诗学的走向。

三、晋安诗派对清初元诗接受的影响

四库馆臣在为王士禛《渔洋精华录》撰写提要时说:“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36]明末清初诗学的宋、元风尚,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①,但学术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有重宋轻元的倾向。事实上,以钱谦益、王士禛等为代表的清初诗坛大家,既重视宋诗,也不忽视元诗,这才促成了康熙年间元诗接受的热潮。在这一诗学转型中,晋安诗派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晋安诗派的核心成员在明、清易代之际都已去世,但他们的藏书与诗学活动,他们的人格风范和气节,通过友朋的追忆和著述的传播,仍然继续影响着清初的诗学与文化。顺治七年(1650)夏,徐燊之子徐延寿在时隔十二年后再次拜访钱谦益,钱谦益感伤不已,作《闽中徐存永、陈开仲乱后过访,各有诗见赠,次韵奉答四首》。^[37]大约此时前后,钱谦益正在编纂《列朝诗集》。他撰写的徐燊小传说:“遭时丧乱,兴公、能始俱谢世,而余颓然一老,无志于斯文矣。兴公之子延寿能读父书,林茂之云:‘劫灰之后,兴公鳌峰藏书尚无恙也。’”^[38]在经过战乱之后,钱谦益念念不忘的是徐燊红雨楼藏书是否安然无恙,遗憾的是,钱谦益的绛云楼已在顺治七年付之一炬了。绛云、红雨,同为明末东南最著名的两座藏书楼。徐燊藏有元人别集68种,这一数量在明末仅次于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著录的113种,名列第二。他们的藏书活动,无疑带动了清初元人别集的收藏热潮,推动了元诗的文献整理与阅读、传播。就钱谦益本人而言,由于时代变革与身世之感,他阅读元人诗集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元遗民。其《列朝诗集》甲前集收录元、明易代之际诗人115家,大力表彰元遗民诗人,破除了夷夏观念轻视元遗民诗人的偏见。

康熙初年,徐延寿路过扬州,与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禛定交,王士禛也非常关心徐燊藏书的命运:“徐延寿,字存永,闽人徐燊兴公之子也。家鳌峰藏书,与曹能始、谢在杭埭,乱后并田园尽失之。”^[39]对于同样喜爱元人诗集的王士禛来说,徐燊的那些孤本秘籍应当是他最为牵挂的。王士禛自少至老都喜欢阅读元诗,尤其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前后,在京城向朱彝尊、黄虞稷等人借阅了

^① 例如蒋寅注意到钱谦益、王士禛对宋、元诗的提倡,参看蒋寅《拨乱反正的钱谦益诗学》第二部分“对宋元诗的复兴——兼及与程孟阳的诗学渊源”,见《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5-165页;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载《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54页。

大量元人诗集^①,包括徐燊较欣赏的《傅若金诗集》,阅读时“如行黄茅白苇间,忽逢嘉树美箭,为之眼明”。^[40] 王士禛不仅阅读元诗,而且在《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笔记中讨论元诗,并对谢肇淛《小草斋诗话》有所征引和批评。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诗人朱彝尊(1629—1709),其《潜采堂元人集目录》《曝书亭书目》著录元人诗集134种、137部,是康熙年间顾嗣立(1665—1722)编纂《元诗选》的重要文献来源,而朱彝尊和顾嗣立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徐燊的影响。朱彝尊曾说“兴公藏书甚富,近已散佚。予尝见其遗籍,大半点墨施铅,或题其端,或跋其尾。好学若是,故其诗典雅清稳,屏去穠浮浅俚之习。”^[41] 顾嗣立在《元诗选初集》中也直接引用徐燊有关元人萨都刺诗集版本的考证。^[42] 如此等等。

除了藏书,晋安诗派对清初元诗接受影响较大的是曹学佺编纂的《石仓元诗选》。自明代中叶至明末,元诗选本只有寥寥数家,而且规模较小,因此,选诗近四千首的《石仓元诗选》为读者阅读元诗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也为学者们进一步编选元诗总集提供了参照。康熙年间,元诗选本的编纂出现高潮,仅流传至今的就有汪楷《元诗吟解集》、顾立功《元诗窥》、吴绮《宋金元诗永》、陈焯《宋元诗会》、陆次云《元诗善鸣集》、顾嗣立《元诗选》、姚培谦《元诗自携》以及官修《御选元诗》等,其中大多数参考了《石仓元诗选》。如《元诗吟解集》四卷,是汪楷编《十二代诗吟解集》中的一部分,从书名和分卷就可以看出该书深受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影响;陈焯编纂《宋元诗会》,自叙资料匮乏,编纂三年后,才见到潘是仁和曹学佺的宋、元诗选,尽管原书漫漶阙烂,还是迫不及待地加以摘选;^[43] 顾嗣立编纂《元诗选》,在《凡例》中历数重要的元诗选本,也将曹学佺的诗选列为必备的参考书目。康熙年间元诗选本的兴盛,尤其是顾嗣立《元诗选》的成功问世,标志着元诗成为一时风尚。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应邀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作序,明确否定了“元诗不如宋诗”的偏见,认为“宋诗多沉僵,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44] 这极大地提升了元诗的诗学地位。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时,顾嗣立将《元诗选初集》进呈御览,得到皇帝赞许,后来奉旨编纂《御选元诗》,更是将诗坛自发形成的诗学风尚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诗学导向。

晋安诗派的创作成就在清初也颇受好评,影响巨大。以曹学佺为例,钱谦益认为他“为诗以清丽为宗。程孟阳苦爱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钟多远声’之句。”^[45] 这一观点得到施闰章和朱彝尊的认同。^[46] 王士禛也对曹学佺给予高度评价:“闽诗派自林子羽、高延礼后三百年间,前唯郑继之,后唯曹能始,能自见本色耳。”^[47] 王士禛曾写信与朱彝尊讨论明诗流派,朱彝尊在回信中历数晚明诗坛兴盛的诗人,在所列南方各省九位诗人中,晋安诗派核心成员徐燊、谢肇淛和曹学佺都榜上有名,^[48] 足见闽派实力之雄厚。晋安诗派创作风格的形成,除了宗唐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元诗的影响。钱谦益对曹学佺诗“以清丽为宗”的评价,与上文所引谢肇淛、曹学佺、徐燊对元人诗“清婉”“流丽”的评价遥相呼应。从创作题材来看,晋安诗派主要模仿、唱和元诗中最有特色的咏物诗;从师法对象来看,晋安诗派最钟情于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例如,曹学佺有《咏走马灯》诗,自注“徐兴公直社”,^[49] 即徐燊轮值主持社集时的诗题,该诗是元人谢宗可《咏物诗》中传诵一时的名作;徐燊与谢肇淛在武夷城中见到“同根竹”,屡次想要赋咏,但没有成功,后来读到谢宗可《同根竹》,认为“不能复继”。^[50] 晋安诗派对元人咏物诗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杨维桢是元末诗坛盟主,以倡导古乐府、咏史诗、香奁体等而知名于世,徐燊《鳌峰集》、谢肇淛《小草斋集》都有大量古乐府和咏史诗,徐燊又有组诗《香奁八咏》《追和杨廉夫续奁二十首》,可见他们曾以杨维桢为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康熙己巳(二十八年)、庚午(二十九年)间,在京师每从朱、黄两家借书,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见《香祖笔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4页。

师法对象。晋安诗派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元诗也可以作为典范学习,这对清初诗学的影响尤为巨大。王士禛曾师法杨维桢作《咏史小乐府》三十五首,孙枝蔚读后认为“阮亭公诗发源汉、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铁崖,乃似欲过于铁崖”^[51];曹溶批评吴伟业诗“消闲入元人”,称他曾经“重唱铁崖新乐府”^[52];顾嗣立有《和元人咏物诗十首》,其中包括贯云石《芦花被》^[53]等等。追溯其诗学渊源,晋安诗派确有首开风气之功。

四、结语

文学风气的形成,除了领军人物的大力提倡,还需要很多人呼应,才能成为一时风尚。明末清初诗坛的宋元风尚,经公安派袁宏道兄弟、明末清初诗坛领袖钱谦益、康熙年间诗坛盟主王士禛的三度提倡,才在康熙年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如果没有一批同好者和追随者,他们对宋元诗接受就只是个人的诗学兴趣,无法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从宏观的角度看,明清诗学演进的主潮是由宗唐过渡为提倡宋元诗,再发展为宗宋。明初的“闽中十子”诗派、明末的晋安诗派和晚清的“同光体”闽派,恰巧分别对应了这三个发展阶段。晋安诗派的核心成员谢肇淛、徐燊和曹学佺,在与袁宏道、袁中道、钱谦益、毛晋等人的交流与对话中,坚守宗唐的地域诗学传统,区别对待宋诗和元诗:对宋诗多有批评,对元诗颇有好感。他们通过诗话、题跋、选本、创作等多种途径批评和传播元诗,极大地推动了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进程。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明末清初主流诗坛提倡“宋元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宣传策略,即人为地将“宋诗”和“元诗”捆绑在一起,联合抵制明代复古派鼓吹的“唐音”。众所周知,元诗的审美特征接近唐音,与宋调不同。将“宋元诗”并举,其结果是既抹杀了宋诗的个性,也无法认清元诗的真面目。而晋安诗派对元诗的批评与接受,似乎更加看重元诗自身的特色。这在元诗接受史和清代诗学史上都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它提醒我们,在唐、宋诗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元诗传统,虽然无法与唐、宋诗比肩,但仍然深刻地影响了明清时期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

注释:

- [1]胡纘宗《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一《杜诗批注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2][4][5][6]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卷二一、卷二二、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01、743、778、750页。
- [3][38][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7、634、607页。
- [7]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二《类选四时绝句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8][9]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10][30]杨镰《元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42-44、37页。
- [11]李玉宝《晚明闽派对王世贞复古思想接受探微》,《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12]陈广宏《晋安诗派:万历年间福州文人群体对本地域文学的自觉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二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 [13]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牧斋外集》卷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43页。
- [14]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26页。
- [15][17][18][19]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序、卷二、卷三、卷三,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四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498、3512、3528-3529、3529页。
- [16]谢肇淛《文海披波》卷八“诗赋”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20][21][22][24]徐燊著、沈文倬点校《红雨楼序跋》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9页。
- [23][25][50]徐燊《笔精》卷四“张思廉”条、“何太虚”条、“同根竹”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1986年。

- [26][27][28]毛晋《元人十种诗》卷首,《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汲古阁本,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 [29]周亮工《闽小纪》下卷“闽中藏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
- [31][34][35]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元诗选》卷十七、序、卷十一,明崇祯间刻本。
- [32][33]徐焞《徐氏家藏书目》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3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2页。
- [37]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7-80页。
- [39][47]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一、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82、302页。
- [40]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七二《跋傅若金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41][4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八、卷二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49、637页。
- [42][4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86、5页。
- [43]陈焯《宋元诗会》卷首《选例九则》,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 [4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三《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 [49]曹学佺《石仓诗稿》卷十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51]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王阮亭〈咏史小乐府〉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52]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四《杂忆平生诗友十四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53]顾嗣立《闾丘诗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廖哲平]

Jin'an Poetry School and the Reception of Yuan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LUO Lu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of po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following the Tang Poetry, until the Wanli Period when Gong'an School advocated the Song and Yuan Poetry. However, Gong'an School just made it as their slogan without action. Comparatively, another poetry school, Jin'an Poetry School, grouped by Xu Bo, Xie Zhaozhe, and Cao Xuequan etc, realized the slogan although they had followed the current of learning from the Tang Poetry. Xu Bo collected many poetry anthologies in his private library Hongyu Lou, including 68 works composed by poets lived in the Yuan Dynasty. Xie Zhaozhe's creative viewpoint about the Yuan Poetry was unprecedented. Cao Xuequan had edited massive poetry anthology of 4224 verses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group of Jin'an Poetry School not only influenced local community, but also had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poetry schools, like Gong'an, and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ics in the period

Key Words: Jin'an Poetry School, XIE Zhao-zhe, XU Bo, CAO Xue-quan, Yuan Poetry